

# 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德怀特·帕金斯\*

**摘要** 新增长经济学关于各种变量因素估计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在实际经历经济快速增长之前, 早已对这种快速增长寄予厚望。中国不处在热带地区, 不属于内陆国, 自然资源也不富裕, 但是, 中国是一个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 中国经历过一段短时期的快速增长, 然而, 这种增长只是长期战乱后的经济恢复而已。直到 1978 年以后, 中国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之后, 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时代才到来。经济开放带来经济增长的事实在跨国研究的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但是, 在中国, 并非所有与 GDP 的高速增长相关的因素都很完美。比如, 在法律规则的制度建设方面, 中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然而, 1978 年后, 经济政策的改变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增长, 而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 GDP 的增长又反过来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个道理: 经济开放政策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关键词** 中国效应, 经济增长原因, 政治的不稳定性

中国自 1978 年以后 25 年的高速增长和结构变化, 并非是凭空出现的。在 1978 年以前, 中国为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付出了一个世纪的努力。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 很多努力都由于战争和政治动荡而失败了, 从而没有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但是, 这些努力却为中国现代经济搭建了基石。在 1949 年到 1978 年之间, 中国只是非常有限地利用了已有的基础。但是像其他很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样, 中国也沉浸在拒绝依靠市场力量的苏联模式中, 只关心封闭经济和高投资率, 进而导致了对生产资料的过分强调。那时,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模式有可能带来最快的增长, 不仅仅是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 (Feldman-Mahalanobis) 模型中的投资者,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如纳克斯 (Ragnar Nurkse) 和缪尔达尔 (Gunnar Myrdal) 也是这样认为, 他们坚信, 通过高投入来动员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有好处的。

近期的增长理论不支持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苏联和中国采取的封闭经济模式, 认为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既有优势, 又有不足。正如我们将来在下文中看到的, 在许多经济学家的跨国回归分析中, 中国的“国别效应”是显著的。所以, 从国际间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 1978 年以来的高速增长

\* 哈佛大学经济系。通讯地址: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02138, USA; 电话 (617) 495-2110; E-mail: dwight\_perkins@harvard.edu

长,有利于我们理解其背后的原因。

要了解1978年以后中国取得了哪些成就,关键是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同50年代到70年代相比,中国为增长所采取的措施有何不同。这里的很多内容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会详述过去25年中发生的许多关键性的政治变革,而是要重点考察这些政治变革如何转化为更高的增长速度和更快的结构变化。例如,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发生的一切与高速资本积累有关,还是与政策和制度变革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有关?过去的25年当中,不同的部门是否都从这些改革中受益?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是否是城市越来越繁荣,而其他地区的人口却远远落在了后面?

## 一、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的简单回顾

中国建立现代工业的努力可以回溯到19世纪80年代,如果算上“中国轮船招商局”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话,这一时间将会更早。除了少数的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和张之洞),中国政府中很少有人理解为什么需要建立一个现代经济,而那些少数找到正确发展方向的人,却苦于没有财政资源来支持他们。<sup>1</sup>即便如此,中国在这个时期还是建立了第一家现代纺织厂以及若干其他类型的现代工厂。在1895年,在外国的武力威胁下,中国开始对外国投资开放。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现代工业以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增长。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施加的不平等条约,对工业采取保护性关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代纺织业仍然成长起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棉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先是从欧洲,然后是从日本,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得益于中国和日本商人在上海及其他地方开设的工厂,中国已经可以自行生产大部分棉纺织品。在20世纪初,由于日本人开始在东北扩大其影响,该地区的铁路、采矿业和重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日本人在1931年成立伪满洲国后,这些产业的发展更加迅速。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国际贸易和国际商业机构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在20世纪初,国际商务、外国市场行情以及国际联络大部分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但是为这些外国公司供应茶叶和丝绸的国内商业始终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数十年之后,外国商人的角色逐渐淡出,中国商人开始占领中国对外贸易的各个领域。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工业增长速度达到年均8.1%,在当时而言这是很

<sup>1</sup> 正如王业键指出的,清政府可用的税收收入仅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其中大部分都用于支持朝廷的运作和军队的开拔(Wang, 1974, 第19页)。

了不起的，但是增长的基数实在是太小了。<sup>2</sup>对1914—1918年和1931—193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保守的估计表明，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年均1.8%到2%，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大约增长1%。<sup>3</sup>然而到了194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都损失掉了。

上述的增长对于1949年以后的增长有作用吗？1937年到1949年间的长期战乱毁坏了大量的厂房和基础设施，尽管后来苏联的援助又为东北提供了一些替代资源，但是苏联军队毕竟从中国东北带走了大量日本的生产设备。然而，从欧洲和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验中我们得知，实物资本是没有人力资本和制度重要的。但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同样失去了一些与管理现代经济相关的人力资源。很多上海的公司都迁往香港甚至纽约，其他的都移到了台湾；在东北的日本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也在几年后离开了。但是中国并没有损失现代经济所需的全部人力资源，也没有损失大量现代基础设施和工业厂房。大多数的工人和领班都留了下来，许多经理人员也留下了，但他们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中没有受到重用。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相当迅速地增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些遗留下来的资源。官方的观点是，直到1952年中国经济才全面复苏。到1952年时，中国遏止了恶性通货膨胀，建立了很多工厂，商业也得以正常运行。农业是当时最大的部门，因为中国的农业较少依赖于现代设备和基础设施，所以恢复得异常迅速。但是，从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恢复过来，通常需要至少三年以上的的时间。例如，日本直到1954年，也就是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九年，才恢复到战争前1939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峰值。<sup>4</sup>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并没有像日本的城市那样被燃烧弹烧成了废墟。

刘大春（Ta-chung Liu）和叶功恰（Kung-chia Yeh）的系统研究直接比较了二次大战前后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他们指出，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比1933年的水平高出了10%。<sup>5</sup>当然，1933年可能并不是中国在1949年以前产出最高的年份，因为日本在193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在东北地区发展工业和基础设施。

因此，1952年以后的加速度增长可能要归功于伴随着复苏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复苏应该被准确界定为恢复到战前大约每年2%的增长趋势，而不是单纯恢复到战前的最大产出水平。中国直到1957年才达到战前每年2%的国内

<sup>2</sup> 罗斯基（Rawski, 1989, 第359页）。这个数字是1912年到1936年间用增加值加权计算的制造业部门的增长率。

<sup>3</sup> 罗斯基（Rawski, 1989, 第339页）。这些数据是罗斯基认为最可靠的估计值，他估计的完整区间是在1.3%到2.5%之间。

<sup>4</sup> 欧卡瓦和罗索夫斯基（Ohkawa and Rosovsky, 1973, 第23页）。

<sup>5</sup> 刘大春和叶功恰（Liu and Yeh, 1965, 第66—67页）。不论国内生产总值是按照1933年、1952年，还是1957年的价格度量，这个结论都是成立的。

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根据刘大春和叶功恰在那篇文章中对于增长来源所做的估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6.4%,其中大约3%可以用生产率的提高来“解释”。因为中国在这段时期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对大部分工业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并转向了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所以经济政策改革不可能同生产力的增加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中国当时采取的措施通常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相联系,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的生产力增加,实际上最有可能是由恢复和平所带来的经济迅速复苏所导致的。

然而,经济复苏并不是全部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0世纪30年代的5%上升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1%到15%。<sup>6</sup>官方公布的20世纪50年代的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甚至更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到25%),但是这些数字实际反映了当时扭曲了的价格。从5%到11%—15%的增加是不能仅仅归因于高速增长的。几乎所有增加的投资都是政府进行的,并由增加的税收收入来承担。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引入了一种苏联营业税的变体,本质上是一种主要基于工业产品的销售税。政府收入的其余部分来自于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的盈利。在苏联模式下,国有企业必须将其全部营业利润上缴给政府。为了产生更多的收入,国家实际上抬高了工业产品相对于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并将得到的净收入增加放入国库。这种制度不仅比以前创造了更多的收入,还制造了扭曲的价格,进而夸大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根据我们稍后在本文中所做的估计,由于价格扭曲而导致的资本形成增加值,可能贡献了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6.4%中的1.4%。

## 二、从跨国回归看中国在历史上的增长潜力

如果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加速增长率可以归因于经济复苏和资本形成的增加,那么在1957年之后,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这一动力明显不再起作用时,是什么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首先,我们将采取国际间的定量比较来研究一些中国经济的潜在特征,这些特征在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阶段以及后来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或者有利于或者不利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加速增长。以这些基本因素作为背景,我们接下来将要考察1978年前后两段历史时期的不同之处。

<sup>6</sup> 不论是使用刘大春和叶功恰(1965,第68页)基于1933年价格的估计,还是使用基于2000年价格的估计(见本文表1)对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估计总是十分接近的。20世纪30年代的数字是刘大春和叶功恰按照1933年价格计算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跨国回归被广泛用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它们所用的解释变量，一般是样本国的经济社会特征以及它们所采用的政策。从这些跨国回归分析中，我们能够了解多少关于中国增长潜力的情况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回归分析中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或者70年代以及更晚的时间。若用于分析更早的时期，这些数据的适用性就是非常有限的，除非假设需要估计的结构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改变。尽管如此，给定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特征，分析这些回归能够带给我们哪些关于中国在1978年以前所经历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信息，仍然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国别效应在跨国回归中可能是重要的，而有些国别效应确实是无法改变的，例如萨克斯-沃纳（Sachs-Warner）增长方程中的地理变量。<sup>7</sup>在他们的回归中，内陆国家相对于临海国家而言通常表现得更糟糕一些。显然，中国不是内陆国家。方程中所采用的一个类似的变量是海岸线长度与陆地面积的比率（即单位国土面积上海岸线的长度）。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如何，取决于这个变量是如何度量的。中国的陆地面积中大约有一半是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同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没有什么关系。排除这些地区将会使中国的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变得相对有利，即使没有日本或者越南的比例那么突出。这个变量还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为什么中国沿海省份比内陆省份增长得更加迅速。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内陆省份在1978年以前的时期内做得很好，但是从那以后至少在相对量上做得很差。但是，正如表1中的数据所显示的，即使中央政府在1978年以前花了很大努力将财政资源从沿海调往内陆，内陆省份在改革前后都是落在沿海省份之后的。沿海省份在1978年以后的增长速度稍微高于内陆省份的增长速度，这种差距在边际上看并不显著。沿海省份在1952—1978年间的总增长率大于33%，或者说年均增长高于1.1%，而在1978—1998年间的增长率大于46%，或年均增长速度高于1.9%。最后，中国并不是热带国家，而地处热带被视作对增长具有负面作用。将这三个变量放在一起考虑，中国似乎具有超过2%的年均增长潜力，这比其他的内陆国家、热带国家以及单位面积海岸线长度较短的国家都要高。<sup>8</sup>

<sup>7</sup> 此处对于萨克斯-沃纳增长模型的讨论转引自亚洲开发银行（ADB，1997，第328—333页）。

<sup>8</sup> 这种优势大部分来自于中国没有被其他国家的陆地所包围以及不是地处热带。

表1 根据200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省份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1978 (1952=100)	1998 (1978=100)
沿海省份		
北京	1590.7	652.3
天津	619.3	593.8
河北	432.6	741.7
辽宁	665.8	532.7
山东	466.2	936.6
上海	888	611.9
江苏	371.4	1072.9
浙江	419.5	1248.2
福建	451.2	1289.3
广东	374.3	1367.1
海南	无数据	872.1
沿海省份平均	627.9	904.65
内陆省份		
吉林	425.6	634.5
黑龙江	495	424.1
山西	485.1	558.4
河南	306.4	790.1
内蒙古	452.2	657.4
陕西	553.4	603.7
甘肃	458	539.2
青海	825.9	394.5
宁夏	934.5	550.4
新疆	455.5	751.3
安徽	245.3	783.4
江西	300	731.9
湖北	399	765.5
湖南	390.3	561.2
广西	529.3	590.5
四川	385.4	591.2
贵州	367.3	561.4
云南	459.8	646.5
西藏	无数据	537.7
内陆省份平均	470.44	618.6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增长回归中的其他大多数跨国变量都是随着时间变化的。为了避免由于内生性所导致的偏差,这些回归在实践中通常采用一些变量在可用数据集中的期初值,例如表征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变量。在过去几十年中众所周知的是,主要依赖于以自然资源出口为基础的国家在维持高速增长方面往往表现得很糟糕。最近二三十年中跨国回归的数据证实了这个现象,但是我们能将这个结论应用于更早的时期吗?

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几十年间主要是一个茶叶和丝绸的出口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依然主要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到20世纪7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完成了向制成品出口国的转化。我们是否能够总结出以下结论，在20世纪50年代或甚至更早的时间，中国同其他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然后在它成为一个制成品出口国时，中国在优劣对比中处于一个优势地位？然而，一种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初级产品占出口的比重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产物，大多数国家从初级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其人均收入的增加逐渐转化为制成品出口国。初级出口品占总贸易量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均收入的函数。尽管如此，有一种看法认为，丰富的矿产资源通常会导致有害于增长的政策，即使我们无法从初级出口品占总出口的比率中发现这种影响。甚至在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水平下也是如此，正如伊朗和其他许多国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然而，我们可以说中国在现在不是，在过去也不是一个依赖矿物出口进入国际市场的国家，这无疑成为了中国的一个优势。

巴罗（Barro，1991）的早期工作和阿里西那等人（Alesina *et al.*，1996）最近的研究表明，政治不稳定会导致增长的缓慢。很明显，政治不稳定是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特征，而且同中国在1949年以前经历的缓慢增长有密切联系。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从一个与增长相关的角度来定义政治不稳定，而这种定义又是在很多国家都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把中国考虑在内我们就会遇到如下问题：中国经历了太多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动荡，而这些政治动荡的类型又随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输给了日本，在1911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在1931年没有抵抗便将东北“让给”了日本，然后又同日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1937—1945年），这还没有包括在1950—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实际上，这个国家从1928年起就开始了国内战争，直到1949年才结束。在1911—1928年期间，中国的所谓“中央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统治过整个国家，而且政权总是在不同的军阀之间变来变去。在1949年以后还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者都具有使投资决策分散和引起混乱的性质。显然，中国的经济遭到了这些政治动荡的影响，但是增长回归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大比例的增长受到了影响。

在巴罗的增长方程中，另一个和中国显著有关的重要变量是教育。在增长回归中，对教育的度量有各种形式，从小学入学率到2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学教育的百分比。这些方法中没有一种能够恰当地反应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50年代中国的增长潜力，因为入学率在世界范围内随时间迅速增加，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50年代非常高的中学教育比例按照60年代或者70年代的国际标准来看就会显得很低。但是，中国像其他具有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亚洲邻国一样，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前半段处在一个有利地位，能够在维持一定程度教育质量的同时尽量扩大教育体系的规模。当然，具有这种能够不以

牺牲质量为代价迅速扩大规模的潜力,并不意味着中国确实利用了这个机会。

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能表明20世纪前半段在中国处于不同教育水平上的人口到底有多少,但是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男性是有文化的。早在1952年中国就有大约300万中学在校生,虽然毕业生的数量要少得多。对于一个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而且中学毕业生占总人口不到1%的国家而言,在维持一定水平的教育质量的同时扩张教育体系显然不是容易的,而这恰恰是非洲大部分国家在独立之前的情形。到1960年人们开始使用增长回归的时候,中国有大约1500万中学在校生,占总人口中该年龄段人口的17%,或稍高一些。<sup>9</sup>

许多增长方程中都包含了表征世界主要地区的虚拟变量,它们大概能够包含一些没有被直接度量的国家特征。同其他代表非洲、南亚、或者拉丁美洲的虚拟变量相比,代表东亚的虚拟变量通常具有更大的正的系数。这个虚拟变量部分地包含了由于和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处在同一地区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但是,这些外溢效应在1960年以前显然是较小的,而且直到1978年以后才对中国发生作用。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日本是东亚惟一个经历持续增长的国家,对中国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为直接投资的形式,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效果被日本试图征服大部分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努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抵消了。

不同的增长回归中还尝试了许多其他的变量。例如,萨克斯-沃纳采用了一个度量开放程度的变量,而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无论依据什么标准都具有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制度,尽管这种开放是被外国军舰和国际条约所强加的。但是,中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树立贸易壁垒,同日本的战争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除了和苏联集团保持联系之外,中国实际上和外部世界隔绝了。西方在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后对其施加的贸易禁运,使得中国没有选择,只能投靠苏联集团。贸易禁运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结束。显然,贸易禁运以及依赖苏联集团作为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行为损害了中国的增长,但是,这种损害到底有多大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最后需要谈一谈影响经济增长的制度的质量。支持现代市场经济的强有力的制度显然是有利于增长的,但是中国在这个方面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呢?在某些方面,如司法制度,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处在最低水平,当时毛泽东取缔了所有的律师,国家不得不几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司法系统。腐败——另一个同制度质量相关的变量——在中国毫无疑问是个大问题,但是中国的腐败比泰国或者阿根廷更加严重吗?我无法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基于对商界人士的调查也很难提供一个对腐败程度的可信的度量。

<sup>9</sup> 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当年大约有9000万人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1960年的数字稍微小一些。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4,第89页。



另一个衡量制度影响的方法是回溯很久以前的历史，将欧洲人选择定居的地区和他们没有选择定居的地区进行比较，将定居的情况作为工具变量表征存在于增长之前的制度的潜在质量。然而，除了条约所覆盖的港口城市，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任何欧洲强权的殖民地。如果说中国在历史上确实具有一些优势能够使其创造强有力的制度，那么这种优势来自于中国民众具备的建立和运作复杂组织的能力，这些组织包括贸易行会以及全国范围内的银行系统（如山西票号）。中国在现代社会之前在组织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一个基于考试选拔的官僚体制。在19世纪之前、罗马帝国衰落以后的世界里，这个官僚体制被证明是能够统治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都要大的地区。

上述对于增长回归文献的简要回顾告诉了我们哪些关于1978年前和1949年前中国增长潜力的情况呢？即使能够恰当地度量所有的相关变量，我们也不能仅仅将这些增长方程中有利的和不利的变量简单相加，就得出中国的增长潜力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好还是坏的结论。在这个简要回顾中，我们考虑了来自许多不同方程的变量，如果将所有的变量放在一个方程中，那么它们的系数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很多系数也会变得在统计意义上不再显著。例如，萨克斯-沃纳的研究中没有包含政治变量，因为当加入他们首选的变量之后，这些政治变量就不显著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方程中得到如下结论：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但是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其他变量以某种方式解释了政治不稳定对于增长的影响。

无论如何，在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之后，最近一些年中所采用的各种各样的增长方程似乎表明，中国具有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具有建立和管理复杂制度的能力，拥有一个相当高质量的现代教育体制，而且在1960年以后还得益于快速增长的东亚的影响之中。而抵消这些优势的正是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主导中国的政治混乱局面——至少1949年以前是这样的。

### 三、1949—1978年改革以前的阶段

我们之前基于历史分析和对增长方程的回顾都说明，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消灭战争和政治混乱的话，中国本来具有得以迅速增长的机会。事实上，这实际上在1949年做到了，且维持了一段时间。正如我们在之前所提到过的，加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新政府努力提高对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另一方面从战争破坏中重建的恢复期可能一直持续到1952年以后，即官方公布的全面恢复日期之后。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同来自于我们所讨论过的增长方程的一些发现是背道而驰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到

20世纪50年代,除了和苏联集团的联系外,中国事实上对外面的世界封闭了本国经济。在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后对其施加的贸易禁运毫无疑问使得中国没有选择,而只能向苏联靠拢,而贸易禁运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结束。但是中国的很多领导人直到1976年以前一直反对任何向世界全面开放本国经济的行为,向世界开放已经是在美国取消贸易禁运之后一些年的事情,而这离中国与其他非苏联集团国家恢复贸易往来的时间就更远了。

中国从1955年开始全面引入苏联模式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发生在1955—1956年,大约在同一时间几乎整个国家的工业和大型商业都被接管。在对此之后年份的国际增长回归中,表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虚拟变量的系数是负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如果采用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截面数据的话,这个系数会是怎么样的。苏联从1944年到1955年以年均5.9%的速度增长,在这段时间的最后五年中,即1951—1955年期间,甚至以高于7.6%的速度增长。<sup>10</sup>直到很久以后,指令性计划经济才毫无疑问地拖了增长的后腿。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1953—1957年期间,官方公布的中国净实物产品增长率是每年8.9%,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这里的增长率被扭曲的价格夸大了,工业产品非常高的相对价格导致了迅速增长的工业部门在净实物产品的计算中被赋予了较高的权重。如果采用1933年或者2000年的价格来估计净实物产品或者国内生产总值,而且仅仅调整价格但是接受官方的部门生产数据,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较高的6.4%。<sup>11</sup>

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尝试了一种替代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方案。并不是所有在这个阶段的变革都同中国以外的发展经济学家的一些传统理念背道而驰。缪尔达尔和纳克斯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增长的关键在于大规模动员闲置劳动力来创造资本。纳克斯坚信通过国家直接动员劳动力的方法,缪尔达尔则相信施加进口限制能够促使进口替代型企业雇佣那些本来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在“大跃进”期间,中国实际上在农业部门采取了纳克斯的方法,通过搬运数量空前的泥土和岩石来建造大坝、灌溉渠以及其他形式的农业设施。<sup>12</sup>在工业部门的主要创新是放弃了刻板的中央计划,

<sup>10</sup> 净实物产品的苏联官方数据甚至比这个还要高。这些数据来自于 Abram Bergson(1961,第210页和第217页)对卢布计价的生产要素成本的估计。

<sup>11</sup> 刘大春和叶功怡(Liu and Yeh,1965,第66页和第271—273页)没有使用很多官方的部门数据。他们按照1952年的价格估计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增长率是6.2%,如果按照1933年的价格估计则是4.6%。但是当他们采用官方数据时,得到了以1952年价格衡量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为8%,如果按照1933年价格计算的话比6%稍微高一点。

<sup>12</sup> 作为这些政策的设计师,毛泽东不可能曾经听说过纳克斯,或者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种观点。他的灵感大概来自中国历史。在两千多年中,动员劳动力修筑运河、灌溉系统以及其他设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动员劳动力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

代之以基于政治调节而不是市场调节的分权决策制度来确保投入和产出的协调。现在我们众所周知的是，这些方法以及在当时采用的其他措施导致了经济混乱和资源的大量浪费。到了1961年中国深深陷入经济萧条当中，千万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根据官方数据，相比较1959年的峰值，净实物产品在1962年下降了35%，相对于1957年的水平则下降了14%。

中国在1960年以后重建了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尽管很多企业及其计划目标的决策权被下放到了省一级甚至更低。从1966年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另一场大型的政治剧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据官方记录，它一直持续到1976年。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并没有什么经济内涵，更多的是针对基本社会价值观念的体制改革。在这场运动导致的政治破坏的顶峰时期，即1966—1968年间，净实物产品下降了14%，但是随即得到迅速的恢复。从纯粹经济角度来看，同“大跃进”时期浪费了大量资源建造毫无意义的工程项目相比，“文化大革命”更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性罢工，而不是一个设计糟糕的发展计划。此后，中央计划继续存在，但是很多计划工作者都下放到了农村，留在办公室中的人只有极少数愿意尝试改革，因为改革的结果往往使得他们卷入到政治麻烦当中去。我们下面将要谈到，令人吃惊的是，尽管速度很慢，但是这个经济体却在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

#### 四、1978年后的政策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政策的改变甚至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中国领导人早在1977年就决定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对于具体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只有一个非常泛泛的想法。早期的措施是允许企业比以前更加自由地从外国购买产品，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如何支配这些进口品。在这个阶段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因为人们相信中国具备足够的近海石油储备。当然，这种想法最终并没有实现。然而，直到1978年，中国才采取了一些从本质上改变经济政策的步骤。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没有人知道这些改变对于中国将会是何等的重要。

在1978年以后发生的政策变革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仅仅尝试对一些主要的改变进行简短的概括。然而，在给出这个简短概括之前，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经济增长核算以及增长方程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关于1978年前后不同之处的信息。

要分析改革期间以及改革之前中国经济的表现，我们需要从弄清楚问题开始。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改革是否引发了一些能够加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一旦确定增长的确加速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1978年前后哪些情况发生了改变。这个问题可以在两个层面上作出回答——增长的最根本的源泉，例如资本、劳动力以及生产率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哪些政策变动带

来了最大的变化?

中国同高收入国家相比,更多的是依赖资本还是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增长?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次要的。与一个发展经济学家更相关的问题是,他所关注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否实现了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增长速度上的不同应该归因于该国高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还是较高的生产率的增长?在中国这个例子中,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中国在1978年以后是否在某些增长源泉方面表现得比1978年以前更好,然后我们希望了解中国在1978年前后是否比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

人们进行了许多不同的尝试来度量中国的增长源泉。所有这些计算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数据问题,我们这篇文章也不例外。最基本的关于增长源泉的计量方程是十分简单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资本增长率、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劳动力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函数。<sup>13</sup>与大多数的同类研究一样,本文对资本存量增长率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永续盘存法需要对初始资本存量(在中国这个例子中就是1952年的资本存量)和折旧率进行假设,这两个数据都无法在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中找到。正如表2中的数据所显示的,这些关于初始资本存量和折旧率的不同假设并不会给较晚时期,尤其是1978年以后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带来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早期而言却有较大的影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影响尤其显著。

表2 对资本存量增长率的几种不同估计

年份	初始 $K/O$ 比率 = 2:1		初始 $K/O$ 比率 = 1:1
	折旧率 = 0.025	折旧率 = 0.05	折旧率 = 0.025
1953—1957	3.53%	1.48%	8.08%
1958—1978	5.85%	5.31%	7.76%
1979—2002	10.27%	10.54%	10.55%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以当期价格衡量的资本形成数据来自于不同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资本形成数据仅按当期价格给出。去除这些数据中的通胀因素所使用的价格指数是制造业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制造业部门产出除以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制造业部门产出(作者使用官方指标得到)就可以得到这个平减指数。

正如上文提到的,在估计国内生产总值和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官方在估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度量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sup>13</sup> 如果假设它们不是通过计量估计得到的——计量估计超出了本文的可能性,那么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率的权重或者系数是资本收入和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数据不可得,而且这些数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所以本文的计算使用了来自其他有可得数据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权重。本文中所采用的具体权重是,资本存量增长率占0.4,劳动力增长率占0.6。资本采取稍微高一点的数字而劳动力采取稍微低一点的数字,这对于1953—1957年间增长的不同组成部分的贡献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几乎相同),但是在1957年以后这将会些许增加资本的贡献而降低劳动力和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为在以后这些年中资本存量增长要比1953—1957年间快很多)。

的比率时，采用了高度扭曲的价格。苏联模式的公共财政是主要基于产生于工业部门的垄断利润。在这个体系中农业产品和大部分原材料的价格被压得很低，而大多数制造业的最终产品的价格被抬得很高。这些价格是由政府指令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的。最终得到的相对价格结构给制造业赋予了一个很高的权重，而给初级部门的权重则很低，这进一步导致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远高于用市场价格计算的增长率。这些扭曲价格还使得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远高于用市场价格计算的百分比。在我们这里的研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都是以2000年的价格为基准计算的，这一年的价格主要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在表3中我们给出了官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按照2000年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不同，而官方的投资比率和基于市场价格的投资比率之间的差异在图1中给出。

表3 官方的与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比较

年份	按2000年不变价格	
	官方数据	计算的数据
1953—1957	9.2%	6.4%
1958—1978	5.4%	3.9%
1979—1990	9.0%	8.7%
1991—2003	9.7%	9.4%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官方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99a,第57页)和国家统计局(1999b,第4页)。这些数据同大多数统计年鉴上记载的改革前的净实物产品非常相似，只是稍微有些不同。基于2000年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是近似值。它的计算过程是，首先从以当年人民币计价的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往回推导，利用部门指数计算基于不变价格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在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样每个部门都能得到一个按照2000年价格计价的数据序列，从1952年开始到2003年，将每年三个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加就得到了以2000年价格计价的年度总量。如果认为三个部门之间存在相对价格变动，这个方法就不正确了，需要将每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进行更详细的分解。

最后一个与计算中国的增长来源有关的问题，也是我们将要在文章中处理的，就是计算劳动力的增长率问题。我们对劳动力总量的增长率进行了调整，以便解释在农村劳动力、城镇中没有中学文凭的劳动力以及城镇中具有中学或大学文凭的劳动力这三者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不同。然而，对于官方劳动力数据的粗略观察就可以清楚表明，在1989年到1990年之间对于劳动力总量数字的计算发生了一些变化。<sup>14</sup>这可能是劳动力具体界定方面的变动，也可能是一次性的纠偏，以便补上前几年遗漏的增量。在没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识别和纠正这个偏差之前，我们只能采用这些数据，同时应该注意到这将会导致对于劳动力增长率的高估。表4给出了我们对于增长来源的估计。

<sup>14</sup> 劳动力总量从1989年的5.57亿，一跃成为1990年的6.53亿，增长了九千六百万，而当时的年平均增长只有一千五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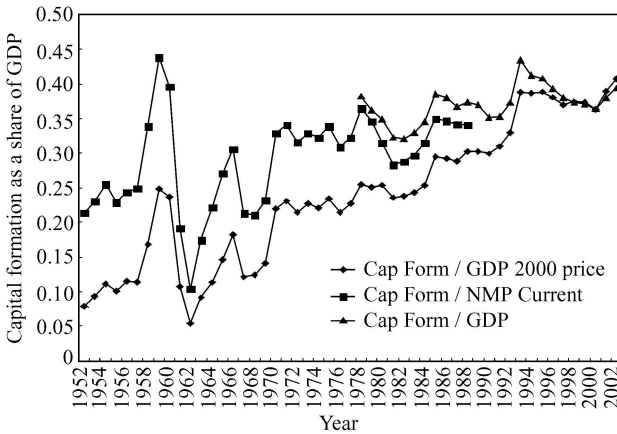


图1 当前的与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构成图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资本形成（固定资本加存货）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净实产品的百分比在大多数统计年鉴中都可以找到。以2000年价格为基准的数据是作者计算得到的。利用工业价格指数平减官方的资本形成水平就能够将其转化为以2000年价格计价的数据，接着再用基于2000年价格的资本形成数据除以用200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资本形成而言，一个恰当的价格平减指数是在1952年到2003年期间的每一年，将不同的权重赋予生产资料制成品价格指数、建筑价格指数以及其他资本形成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价格指数或者权重都是无法获得的。

表4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来源

年份	资本的贡献	劳动力的贡献	生产率的贡献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953—1957	1.412	2.016	2.972	6.4
1958—1978	2.340	2.142	-0.582	3.9
1979—2003	4.108	2.316	2.676	9.1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在这里的计算中使用了表2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假定初始资本存量是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两倍，折旧率是0.025。通过将劳动力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增长率将人力资本包含在内。这三个组成部分是初级部门劳动力、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中未完成高中教育的劳动力以及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中完成高中或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对于这些不同种类的劳动力所赋予的权重是基于农业工人的人均收入（含少许技术含量的城镇工人的平均工资），以及在一些要求大部分工人至少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部门中的平均工资。赋予劳动力增长率的权重被假定为0.6，而资本存量增长率的权重是0.4。

对于表4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是，1978年以后的增长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从一个负数变为一个较大的正数。仅仅这一个变化就导致增长率每年增加了3.26个百分点。同1978年以前相比，劳动力增长率在1978年以后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稍微大了一些。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劳动力总量的增长率持续保持在每年2.96%的高水平上，但是在1990年以后急剧降低到1.09%。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在那一年开始

发挥作用，减少了劳动力市场进入者的数量。<sup>15</sup>

因此，在1978年以后尤其是1990年以后，劳动力贡献的增加应归于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中具有更高生产率的职业的转移，以及教育系统的迅速扩张。举例而言，到2002年虽然总人口的45%只有小学教育水平甚至更低，但是12%的人口完成了高中教育，还有5%的人口完成了大学教育。<sup>16</sup>与之相比，在1982年的总人口中，仅有0.6%完成了大学教育，另外6.6%完成了高中教育，而58.9%的人只有小学教育水平甚至更低（12岁以上人口中23.5%的人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在更早的1964年，大学毕业生甚至不到总人口的0.4%，高中毕业生仅占总人口的1.3%，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占总人口的66.4%。<sup>17</sup>如果考虑到不断提高的教育质量以及很多在城镇工作的工人户口还在农村，那么在1978年以后尤其是1990年以后，劳动力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贡献比我们这里的估计还要高出许多。<sup>18</su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78年以后的增量中，不是由生产率增加所导致的那部分增量中的大部分（1.8%）都可以被资本存量的加速增长所解释。但是中国在1978年以后并没有付出任何额外的努力来提高资本存量的增加速度。中国的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78年以后实际上略有下降，直到1985年才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即38.2%，从那以后一直在这个水平上小幅度地上下变动。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的提高是由伴随着高速增长的内生产总值的投资努力所带来的。因而，高速经济增长部分通过资本存量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得以实现，但是资本存量增长速度的提高实际上又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不是由增加储蓄以及将这些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努力所导致的。

如果我们将上述结果同阿文·扬（扬，1995）关于东亚四小龙的结果进行对比，那么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结果看起来同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结果相差无几。在本文中稍微高一些的残差或者生产率的估计值可能来自于我们的研究与扬的研究之间的两个不同点。本文的分析着眼于整个经济，而不是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扬的研究对于劳动力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表现出的性质差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解。然而不同于扬的估计，我们还拥有研究对象国家在开始其主要经济改革之前那一时期的数据。相对而言，扬采用的东亚四小龙的数据则是从其主要改革进程起步之后才开始有的。中国这些早期数据的可用性使得我们能够相对比较简单地说明中国增长的加速度在很大程度上

<sup>15</sup> 在计算这些劳动力增长率变动的时候，我将2002年/2000年与1989年/1978年进行了比较。这样一来，我就从增长率的计算中消除了1989年到1990年间官方劳动力数据存在的数值跳跃的问题。

<sup>16</sup> 这些数据来源于2002年对1200万人所做的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来自国家统计局（2002，第106—107页）。

<sup>17</sup> 这些数据来源于1964年和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参见国家统计局（1984，第87页）。

<sup>18</sup> 我并不知道所谓的“流动人口”中有多大百分比被视作城镇劳动力，但是我的假设是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并不会将这些工人中的大部分包括在内。

应归因于生产率的加速增长。<sup>19</sup>

给定生产率的提高作为中国在1978年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加速增长的核心原因,我们是否可以使用跨国增长方程的定量分析技术对改革如何导致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呢?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多数对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的估计都采用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sup>20</sup>尽管如此,让我们回顾一下巴罗和萨克斯-沃纳的回归方程中一些在统计上显著的变量,看一看中国关于这些变量的情况如何,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中国在1978年以前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经济体,在萨克斯-沃纳的开放指数上排名非常低。但是,随后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如果以开放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来衡量的话,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排名是相当高的,而到了2000年的时候排名更高。<sup>21</sup>中国是伴随着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不到1000美元的人均收入进入改革阶段的,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比其他那些具有较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要快一些。到了上世纪末,因为中国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超过了4000美元,这种后发优势显著减小了。<sup>22</sup>

巴罗特别强调了学校教育和零岁人口期望寿命,两者都可以作为对人力资本的度量。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衡量,中国甚至早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具有了高达63.2岁的期望寿命,到2000年时增加到了71岁。<sup>23</sup>高于基础值的男性平均教育水平在巴罗的方程中对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初期远远低于巴罗样本中国家在改革初期时具有的中等教育的平均水平,但是到了2002年已经上升到了略微高于平均水平。<sup>24</sup>中国在1982年时中学教育的平

<sup>19</sup> 我们同样可以说明韩国的加速增长最初是由1961—1963年间政策的根本性变动导致的,而台湾地区的加速增长最初是由1960年的政策变动导致的。参考苏立民等(Hsueh *et al.*, 2001,第6章)。

<sup>20</sup> 全要素生产率当然无法在任何标准的数据来源中找到。每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按照一种在国家之间保持一致的方法进行估计。在一个粗略的层面上讲这并不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参见Perkins and Syrquin, 1989,第1737—1738页),但是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sup>21</sup> 萨克斯-沃纳采用的描述开放程度的变量是一个综合指数,包含了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低于40%的平均关税率,以及配额和许可证是否覆盖小于40%的进口产品。中国在1978年以前在这两方面都是封闭的,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两者的数值都低于40%。一个国家要想在开放指数方面排名很高,那么这个国家在外汇黑市上的溢价必须低于20%——我们确实不知道改革以前那些年的溢价是多少,由于对黑市交易的处罚非常严厉,因此,考虑了由此而产生的限制之后,交易参与者所能获得的受益是非常少的。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如果溢价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一定低于20%。最后一个指标是出口税率应当适中,而中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只有出口补贴,却几乎没有净出口税。

<sup>22</sup> 在涉及到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我总是倾向于采用任若恩的估计值,因为任若恩在估计购买力平价汇率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最为系统的,将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同组成部分都包括在内了。

<sup>23</sup> 联合国开发规划署(UNDP, 2003,第264页)。

<sup>24</sup> 巴罗样本中的学校教育变量的平均值是等于或者大于1.9年时间的中学教育(Barro, 1996,第15页)。



均水平小于 1，但是到了 2002 年时大约为 2，略微高于巴罗样本中 1.9 的平均水平。总人口出生率是巴罗方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变量。中国的总人口出生率在改革前高达 4.9，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迅速下降到 1.8。这个变量同赡养比率相关，进而影响储蓄和投资水平，但是同人力资本的相关性并不大。

巴罗和萨克斯-沃纳都加入了声称能够衡量制度好坏的变量。如果能够被恰当地度量，巴罗的法治变量在我们这里的分析中肯定是适用的。中国开始改革以后在法治方面做得很少，虽然后来致力于改善这种情况，但是就算仅仅要达到较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的中低水平，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萨克斯-沃纳采用了一个复合变量，包含了一系列同制度好坏相关的因素，但是他们在对单个制度的度量方面有一些问题，把这些可疑的度量组合在一起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一个国家整体制度的好坏。当然，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所有的制度都是很薄弱的，但是采取粗糙的定量方法很难得到更进一步的结论。

经济增长核算估计以及巴罗、萨克斯-沃纳等经济学家的增长方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从改革初期到现在 25 年来关于中国经济的潜在优势与不足的信息。然而，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告诉我们中国从 1978 年开始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导致了后来的高速增长。很多人指出，将“新增长经济学”的结论转化为对将来的具体政策性建议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试图将上述结论转化为一个对中国在过去所采取的关键性政策变革的解释也是很困难的（Easterly, 2002）。为了了解中国做的哪些事情发挥了作用，我们必须考虑中国从 1978 年以来采取的具体措施，然后尝试在那些措施和经济结果之间建立系统的联系。这主要是经济史学家的任务，我们在这里仅仅试着给出一个简要的概括。

中国在改革之初的两项举措最为基本。第一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就是对外开放；第二项是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农业集体化。后者发生在 1979 年到 1984 年之间，它是导致农业在这段时间里异常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这段时间，农业投入也有所增长，但是最重要的是制度变迁的作用，它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并带动了经济的增长。

另一个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重要改革举措是决定开始放开工业投入品市场。令大多数观察家吃惊的是，这项改革措施带来了乡镇企业的繁荣成长。乡镇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来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农村小规模工业的有计划发展，在那段时间工业技术和管理技能被引入了农村，但是这些小规模工业要依赖于计划分配的投入品进行生产。在 1984 年以后，这些厂家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其需要的原材料，于是他们开始寻找被国有工业部门忽视的生存空间。在一个苏联模式的指令经济中，这样的机会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于

是这些小规模乡镇企业很快就为他们的产品找到了市场,然后开始迅速扩大规模,他们的扩张速度要比国有部门快很多。

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考虑,乡镇企业的繁荣要么与资本从国有企业部门转移到乡镇企业部门有关,要么这种繁荣就是由乡镇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的。对于后面这种原因似乎是正确的。在乡镇企业繁荣的那段时期里,流向乡镇企业部门的资本份额并没有显著增加。这里所谓的资本份额实际上是包括城镇集体企业在内的整个集体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1981—1984年乡镇企业开放之前,这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12.5%,到了1985—1988年乡镇企业繁荣的第一个阶段时这个百分比上升到13.7%,然后在1989—1991年乡镇企业回落时下降到12.4%,最后到1995年又上升到16.8%。<sup>25</sup>所以,乡镇企业的经历基本上反映了由于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的再分配导致的生产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更大的增长,而不是由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导致的。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自然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因为同样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时能够产出更多的固定资产。然而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分配改革导致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进一步带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反过来是不正确的。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回落到常规发展的轨道上,仅靠乡镇企业已经无法支撑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在乡镇企业部门增长放缓的同时,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却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改革的初期,外来直接投资就被赋予了合法权利,但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十分缓慢,到了80年代末仅达到稍高于30亿美元的水平。伴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市场经济改革的复苏,外国直接投资在当年增长到110亿美元,到1993年增长到275亿美元,然后直到2001年以前保持每年超过4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2001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一跃超过了5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助于维持中国的高投资率,但是资本形成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并没有显著增加。中国在2003年的资本形成总额按当年汇率折合成美元大约是6300亿美元,而当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是535亿美元,或者说比总量的10%少一点。

外国直接投资真正的贡献是引进了新的管理方法、更高质量的机器设备、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进入海外市场的途径。因为在经济增长核算方程中很难分离出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可能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资本贡献的持续增加得以体现的。换一种说法,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通过提高被使用资本的质量来维持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资本质量的提高在我

<sup>25</sup> 这些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9b,第7页)。

们的增长方程中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残差表现出来。

所以说，1978年以后的改革是从一个创新到另一个创新的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再到最后的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这些基础性的创新正在进行当中，另一方面中国同时还在改革的其他方面稳步前进。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对投入品的行政性分配让位于双轨经济，在这个经济中越来越多的投入品能够在市场上按照市场价格获得，而到了20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投入品和产出品都是由市场分配。中国外贸改革的起步与其他很多东亚邻国一样，首先促进出口但同时对进口施加严格的管制，然后逐步放弃了这种重商主义的模式。到20世纪末，大多数产品的进口已经放开，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将确保在服务贸易领域发生同样的情况。

随着市场力量逐渐占据一个又一个生产部门，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同时开始放开劳动力市场。中学在校生的数量从1990年的5000万上升到2003年的9800万，大学生的数量从1978年不到100万上升到2003年的1100万。所以说，中国的人力资本质量在稳步提高。

中国的制度环境依然很薄弱，在制度改革方面的进展也是十分缓慢，而很多增长文献把制度视作维持高速增长的关键。中国质量低下的金融体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用国际间比较来衡量，甚至在东亚地区中国的金融体制排名也是接近最末的，即使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由于政府引导工业化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使得其金融体制异常薄弱。

## 五、结 论

本文的目的是从历史的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的经济表现，重点关注了改革前后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言，经济发展所包含的内容更多，在增长过程中发生的很多结构性变化也是可以从国际间比较和定量的角度加以研究的。对于结构性变化的国际间定量比较是从库兹涅茨（Kuznets）、钱纳里（Chenery）和希尔昆（Syrquin）的工作开始的（Kuznets, 1966；Chenery and Syrquin, 1975；Chenery, Robinson and Syrquin, 1986），尽管这些成果似乎已经过时了，但他们的研究同如何理解今天的经济发展依然相关，这种相关程度甚至并不比几十年前少多少。对于结构变化方面的文献需要做系统性的回顾，还要考虑这些文献能够告诉我们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哪些信息，然而上述两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给定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低收入国家中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因素，中国自1978年以来高速增长的表现本来是不应该令人感到

吃惊的。在1949年以前政治动荡的几十年中,中国增长得异常缓慢,从20世纪50年代末施行中央计划经济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试验开始直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增长略微加快,所有这些现象也不应该是令人吃惊的。中国在1978年以后开始实施的政策,同跨国增长方程所显示的与高速增长相关的政策是一致的。通过采取同开放、提高教育、增进市场的作用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相关的政策,中国得以利用大部分国土临海这一有利条件,而从明朝到毛泽东时期都没有利用这个条件。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同样受益于中国从19世纪末期甚至更早的年代开始就打下的坚实基础。例如,中国所具有的产生大量世界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是建立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之上的。

然而,跨国比较仅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为什么在1978年以后加速增长这一问题的非常概括的描述。基于这些比较分析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做了在此之前其他经济成功的国家所做的事情。然而要真正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做得这么好,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所采取的具体政策以及这些政策达到的具体结果。这些成就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特有的经历,而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的情形的复制。例如,乡镇企业是从早期的农村工业化发展起来的,而支持农村工业化的是中国特有的组织,即农民公社。中国的外来投资者首先来自在周边经济活跃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企业家团体。中国的规模及其潜在的巨大市场使得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一直很浓厚,同时中国正在逐渐建立起长期外国投资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所以说,发展并不是仅仅去做其他成功国家已经做过的事情。每一个国家的经历都有其重要的独特之处,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然而,如果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特点上,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是如何经历了一段长路而开始建立现代工业经济的。另一方面,如果忽视了这些特别之处而只考虑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经历,我们同样无法理解中国这种转变的本质及其步调。

## 参考文献

- [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merging Asia: Changes and Challenges*.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97.
- [2] Barro, Robert 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Vol. CVI, No. 2, 407—443.
- [3] Barro, Robert J.,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698, 1996.
- [4] Bergson, Abram, *The Real National Income of Soviet Russia Since 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 5 ] Chenery , Hollis and Moshe , Syrquin ,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 1950—1970* .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5 .
- [ 6 ] Chenery , Hollis , Sherman , Robinson , and Moshe , Syrquin ,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 A Comparative Study* .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 [ 7 ] Easterly , William ,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 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 Cambridge : MIT Press , 2002 .
- [ 8 ] 国家统计局 《1984 年中国统计年鉴》。香港 经济情报局 ,1984 年。
- [ 9 ] 国家统计局 1999a 《1999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
- [ 10 ] 国家统计局 1999b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
- [ 11 ] 国家统计局 《2003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年。
- [ 12 ]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
- [ 13 ]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 2004》。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
- [ 14 ] Hsueh , Li-min , Chen-kuo , Hsu , and Dwight H. Perkins ,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ate :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 1945—1998* . Cambridge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 [ 15 ] Kuznets , Simon , *Modern Economic Growth* .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66 .
- [ 16 ] Liu , Ta-chung and Kung-chia , Yeh ,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1933—1959* .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5 .
- [ 17 ] Ohkawa , Kazushi and Henry , Rosovsky ,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 Trend Acceler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3 .
- [ 18 ] Perkins , Dwight H. and Moshe , Syrquin , “ Large Countries : The Influence of Size ” , in Hollis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Volume 2* , pp. 1691—1753 . Amsterdam : North Holland Press , 1989 .
- [ 19 ] Rawski , Thomas ,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9 .
- [ 20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 [ 21 ] Wang , Yeh-chien ,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4 .

##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DWIGHT H. PERKINS  
(Harvard University)

**Abstract** Form the lessons of the estimates of the various equations of the “ new growth economics ” , China was well placed to grow rapidly long before it did in fact experience accelerated growth ( China was not in the tropics , it was not landlocked , it was not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 and it had a fairly high level of education for a developing country ) . China did grow rapidly for a brief period in the 1950s but this mainly involved recovery from the impact of long years of war and civil war . Sustained rapid growth did not begin until after fundamental changes in policy from 1978 on , changes such as the opening up of the economy that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the cross-country growth equations . Not all of the variables normally associated with high GDP

growth rates, however, were present in China. Ke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rule of law were largely absent, for example. Nevertheless the policy changes from 1978 on led to accelerated growth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and this higher TFP and GDP growth in turn led to higher rates of capital formation (the share of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in GDP in the reform period did not change much at all from that share in the pre-reform slow growth years). Thus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 is a story of major policy changes leading to accelerated productivity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O43, I10, I21